

闻喜县博物馆藏

《康熙御书碑》

□ 王晓林

《康熙御书碑》(图一)原为朱裴墓遗物,现藏于山西省闻喜县博物馆,此碑立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碑长116厘米,宽42厘米,厚14厘米。该碑四周阴线刻云龙嵌珠,碑文分诗、志两部分,左部为康熙御书中唐诗人常建的《三日寻李九庄》诗文,行书7行,每行4字。右部为朱裴所撰钦赐御书志,馆阁体13行,每行字数不等,且为阴线浅刻,碑文多有漫漶。

御书诗文(图二)为:

御笔

雨歇杨林东渡头

永和三日荡轻舟

故人家在桃花岸

直到门前溪水流

己未初夏敕书

钦赐御书志(碑左半部分)为: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臣启

奏江南□荒事宜在□□乾□门

上召人□赐坐 赐茶

□□科目 出仕历履

臣一一奏对毕

上命□吏给以笔札

命臣写字

臣写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 八字

上览毕

钦赐手书唐诗一首又□□□□

命臣将平时所作诗文缮写 进呈

谢恩而出

户部右侍郎臣朱裴恭纪

志文虽有数字不清,但不影响朱裴受赐御书

情景的完整。在君主专政时期,封建士大夫多以皇帝所赐之物炫耀门庭,朱裴不外乎其二。

如下就此碑文加以浅析。

顺治“以武功定天下”,营造大清帝国。到康熙时开始完善朝纲,同时开拓文化领域,尤其对书法的关注,主要表现为南书房的建立。康熙十分爱好董书,将“海内真迹,搜访殆尽”,他如此看重董其昌书法,这与社会书坛传承关系以及他本人的师承关系是分不开的。首先,董其昌创立董氏书法以来,无论是他的书法艺术,还是他的书法理论,都成为当时众多书法爱好者的共识。其次,师承关系,沈荃于康熙“十年授侍讲,直南书房”,康熙把沈荃当作书法老师,对其书法大加赞



图一 康熙御书碑拓



图二 诗文拓片

誉：“凡制碑版，及殿廷屏障，御座箴铭，辄命荃书之，或作大书，命题其后”。可见康熙甚喜沈荃书法。康熙视董书为圭臬，社会以康熙定一尊。康熙的书法造诣很深，一生摹写和颁赐臣下书法作品无数，可以说，书法伴随了他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活动，成为了他贯彻政治意图的有力工具。他的书法与开“博学鸿儒”科、“六下江南”一样，笼络了汉族士人，改善了满汉关系，最大程度地赢得了汉人对皇帝本人和满族统治的认可。康熙的政治艺术在赐予朱裴的御书诗中可见一斑。

朱裴，字小晋，号绯公，山西闻喜人；本名朱裴，以榜讹裴，遂名裴，清代官吏，以执法严明而著称。清顺治二年乡试，朱裴以榜首中举，三年，进士及第，官授直隶易州知州。清康熙七年（1668年），朱裴改授都察院礼科给事中。奏疏中，他力陈殉葬制度的弊端，“惨忍丧生，未有如此之甚者”，“非盛世之所宜”。康熙皇帝准奏，降旨严禁殉葬。中国殉葬制度由此禁绝。康熙十八年，朱裴任户部右侍郎。康熙十九年引疾乞休，回到闻喜。朱裴的退仕是客观发展的必然，但也与康熙在康熙十八年初夏所赐的常建的田园诗书存在逻辑关系。

常建，中唐诗人。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人。公元727年（开元十五年）登进士第。公元753年（天宝十二年）之前，曾任盱眙（今江苏盱眙县）尉。后去职，隐居于鄂渚（今湖北东南）一带。一生仕途很不得志，却颇具诗名。他长于五言，以山水田园诗著称，意境清远，风格淡泊，构思精妙。常建所写《三日寻李九庄》，暗用桃花源的典故，把李九庄比作现实的桃源仙境，用得非常自然巧

妙，令人浑然不觉。是作者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康熙的御书引用了常建的《三日寻李九庄》诗文，上赐御书诗文是简单的君臣之间的交流还是康熙需要传达某种政治意象？我们做如下管窥。

康熙御书赐予康熙十八年初夏，此碑立于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朱裴退仕于康熙十九年。由此时间顺序不难看出，上赐御书的行为不是简单的君臣之间的沟通或国事咨议，而是通过唐诗之意境来传达对朱裴政治去向的态度。康熙在召见朱裴之时，已成竹在胸，召见时的问江南荒事、看历履、命写字，俱为赐御书之铺垫。上命朱写字，朱写“大哉乾元 万物资始”八字。“大哉乾元 万物资始”是《彖》对《易经》第一卦“乾卦”的卦辞，“元亨利贞”中的“元”进行的解释，意为蓬勃盛大的乾元之气是万物创始化生的动力，在此也借以表达朱裴的政治抱负。但这并没有改变康熙对朱裴去仕的定见。由朱裴所写御书之经过“上览毕，钦赐手书唐诗一首又□□□”可以看出，康熙御书并非当场所写，而是已写好备用，此举充分证明康熙时有备而召朱裴。而“命臣将平日所作诗文缮写，进呈”，也充分体现了康熙融通人性、张弛有度的人格魅力，此举也仅为赐御书所要达目的的后垫。

此碑由康熙的书法、常建的田园诗、朱裴的馆阁体钦赐御书三者融为一体。康熙通过田园诗之意境，来传达对朱裴政治去留的决定。通过解析钦赐御书志，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康熙书法所产生的政治意义和体现的统治艺术。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闻喜县博物馆）